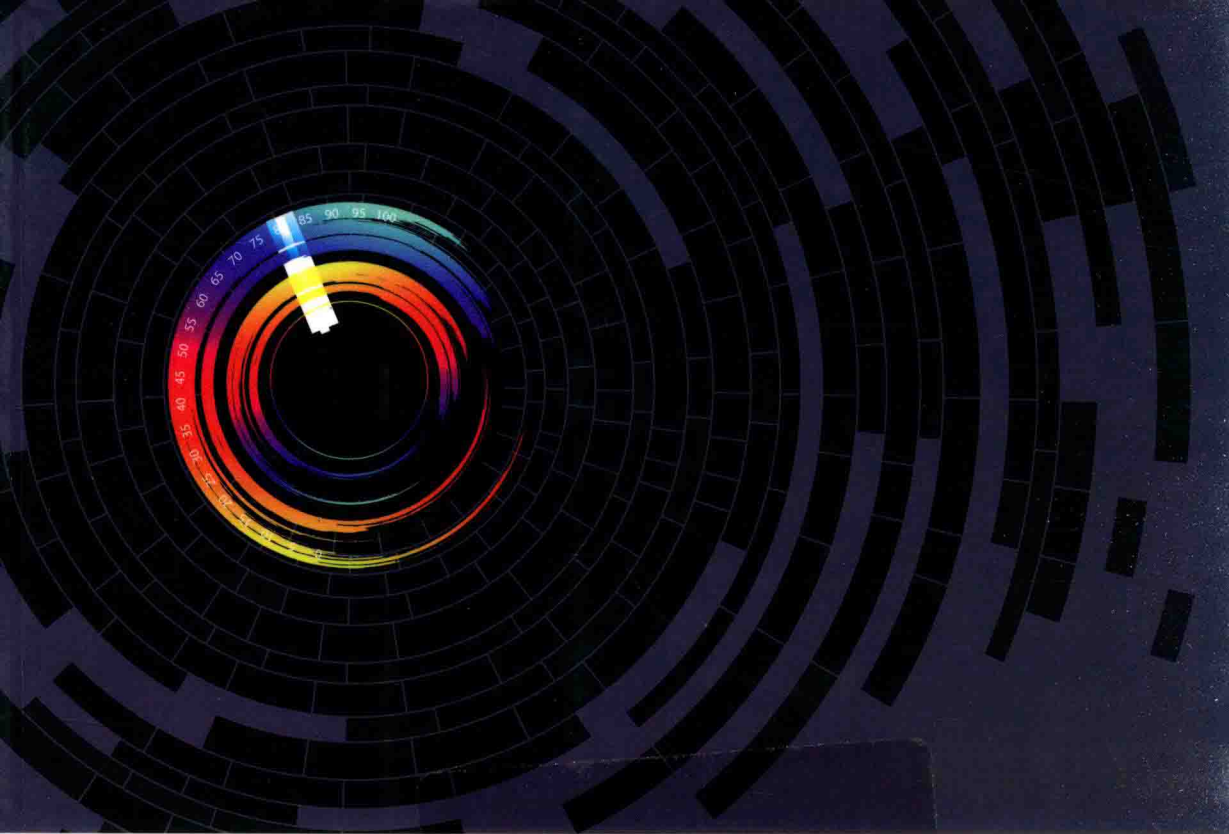




新闻

姜波◎著

BIG NAME VIEWS
CHINESE ECONOMY

大咖

眼中的中国经济

新闻

姜波◎著

BIG NAME VIEWS
CHINESE ECONOMY

大咖

眼中的中国经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 / 姜波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96 - 0020 - 4

I. ①新… II. ①姜…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 - 文集 IV. ①F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6273 号

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

作 者	姜 波
责任编辑	陈礼滢
校 对	薛银涛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83 (编辑部) 010 - 63588446 63567692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6 - 0020 - 4
定 价	48. 00 元

目 录

第一篇 大咖眼中的增长与改革

面对经济波动要有自信	2
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速效解药	8
做好增速“破七”的心理准备	20
保增长和调结构不能兼得怎么办?	26
如何看待“十二五”的“保七”	34
中国经济迅速下滑成因	42

第二篇 大咖眼中的政府与市场

“大政府”不是个好主意	54
既要保增长又要保公正	62
政府应防止被利益集团挟持	68
泡沫经济与社会公平 ——兼述日本政府是如何放纵市场而酿成灭顶之灾的	75
最大的公平是发展先进生产力	83

第三篇 大咖眼中的陷阱与大势

质疑“中等收入陷阱”	96
中国经济何以顺应世界大势	103
人均 3000 美元不是和谐社会的“入场券”	116



第四篇 大咖眼中的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	122
打造国家形象的着力点	134
中国只能承担大国的“有限责任”	146
中国还得“不高兴”一些年	154

第五篇 大咖眼中的非理性繁荣与泡沫膨胀

调控房地产市场：切莫饮鸩止渴	166
“烂尾市场”的治理与博弈	
——从房地产市场调控看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	175
非理性繁荣与泡沫膨胀	186

第六篇 大咖眼中的宏观与微观

广东的改革逻辑	198
中国经济：微观与宏观的冲突	207
“民工荒”是个伪问题	214
逝去的是“纸” 留下的是“报”	221

附 关于“新经济”的对话之一、二、三、四

新世纪“新经济”的对话之一 新经济的新与旧	232
新世纪“新经济”的对话之二 互联网的涨与落	240
新世纪“新经济”的对话之三 全球化的利与弊	248
新世纪“新经济”的对话之四 高科技的喜与忧	256

后 记	264
-----------	-----



第一篇

大咖眼中的增长与改革



面对经济波动要有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极大地坚定了亿万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现在，我们需要增加一种自信，就是对增长速度波动的自信。

一、“底线”究竟在哪里？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几年前，当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衰退之际，人们热烈欢呼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高速增长；而今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金砖国家却失去了增长势头。经过几年调整，美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季度经济增速达到令人意外的4%，失业率也降到7年来最低；欧盟经济也开始上扬，就连引爆欧元危机的希腊都出现了6年来首次正增长；日本的安倍第三支箭效果如何有待考证，但其经济的确走出了近20年的通货紧缩阴影。与此相反，印度的增长率下降到5%左右、巴西的增长率现在是2%左右，俄罗斯下降到1%，有的季度甚至是负增长。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增长”的举措，社会不是也一直稳定吗？

尽管我们中国经济“七上八下”，但仍然是令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却是忙个不停，不停地“微刺激”，有“定向调控”、有“区间调控”，还有“精准调控”。为了不突破银行法规定的75%的存贷比，我们把存款分母增加了两项，把贷款分子扣除了4项，等等。为什么如此辛苦？就是为了这个7.5%！

2014年第一季度增速为7.4%，第二季度微升至7.5%，上半年加权平均为7.4%。其实，2014年实现7.5%的增长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下半年经济出现意外的波动。起码国家统计局准备适度调整GDP的计算方法，向英国和美

国学习，把知识产权、研发投入都算进去，据说可以增加 GDP 上万亿元之多。英国用新的计算方法后，GDP 增加了 3 个百分点，我们中国可能会拉动一个百分点左右。

本来，在 2013 年下半年，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许多人以为今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定为 7%，但最终还是 7.5%。当然，决策部门也许有全面的、宏观、长期的考量，但“十二五”规划的速度就是 7% 呀。而且，2011 年增长率是 9.2%、2012 年增长率是 7.8%、2013 年增长率是 7.7%，即使今年增长率为 7%，全面实现“十二五”增长目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到 2020 年实现收入翻番也是没有大问题的。

有人说，以前保 8，现在保 7.5%，不仅是个速度问题，实际上是为了保就业、保社会稳定。不是有专家计算，7.2% 就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吗？为什么一定要 7.5% 呢？再说，那个 7.2% 的计算就那么符合实际吗？就一个直观情况而言，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使很多企业叫苦连天，这就说明哪怕增速再低一些，人们特别担心的庞大的、流动的、低层次的蓝领就业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因而社会也不会因为就业状况而出现动荡。当然，大学生就业率令人心忧。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就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连年持续提高，这将使得经济增速下行、就业机会增加。因为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计算，相同的投资额，服务业比工业建筑业能多容纳 30% 的就业人数。

人们常说，要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没有人精确地论证过，为什么今年的“底线”一定是 7.5%？难道 7% 就不是“一定的发展速度”？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退一步讲，即使是 6.5%、6%，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各个层次的严密的社会组织管理，有比其他金砖国家都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中国梦”引导着亿万人民建设家园，我们完全可以承受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增速下行的压力。

我们应该增强一些对增长速度波动的自信。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为了防止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的下滑，政府需要一定的“反周期”措施。但是，笔者斗胆进言一句，连年气喘吁吁地“严防死守”，是不是说明我们有些“定力”不够？别说是“壮士断腕”啦，就连“割肉放血”都谈不上，不过仅仅是“伤了皮毛”就大呼小叫，实在看不出

彻底告别 GDP 崇拜的决心。一定要防止一些地方出现“揠苗助长”的倾向。笔者断定，明年政府指导的增长速度将可能是 7%。因为，且不说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下滑，实际上我们这些年的增长，在相当程度是靠大量贷款和债务来堆积的，是靠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来放大的，是靠牺牲生态环境的雾霾来维持的。在这种结构下，一定要警惕增长速度过快所形成的风险。

二、历史经验与“反周期”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经济大体是 10 年一个高速增长—降速调整—再高速增长的大周期。

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还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但人们大干四化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央提出到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30 个大电站等 120 个大项目，与外国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巨额购买设备的合同。“洋跃进”的结果是国家外汇透支、经济比例失调，1979 年开始被迫下马众多工程，解除一些对外合同而不得不赔偿外商一大笔钱，十个大庆落空了，宝钢二期工程延期了。在 3 年调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速（当时我们的统计还未与国际接轨）从 1978 年的 13.5% 下降到 1981 年的 4.5%。

从 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 10% 的增长起，中国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轨道，1985 年增速高达 16.4%。由于持续高速增长，基本建设规模超出了承受能力，并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通货膨胀，加之物价闯关，还有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使得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又是 3 年痛苦的调整期。国民生产总值 GNP（那时还未引进 GDP 的概念）下降到 1989 年的 3.9%、1990 年的 5%。

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1992 年中国经济又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一直到 20 世纪末，骤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已形成“大进大出”结构的中国经济被迫又进入调整期，1998 年的增长率下降到 7.6%。即使在那“七上八下”的几年里，朱镕基同志依然大刀阔斧地主持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几千万企业职工下岗，国有银行开始剥离债务，这才为以后的“黄金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的中国经济高歌猛进，2007 年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竟达到 14.2%！说明宏观经济已经有些失控了，中国

经济急需减速调整。2008 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客观地进入了下行通道。本来应该就势顺应周期、休养生息，但是我们却推出了 4 万亿投资。如何评价“4 万亿”呢，在当时对于维持经济较高速增长是发挥了积极效应的。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当然有必要适度调控以缓解下滑的“加速度”，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把握。我们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人为地把增长速度拉高到 2008 年 9.2%、2009 年 8.7%、2010 年 10.3% 的高增长吗？客观上看，“4 万亿”是为了拉高增长速度而推迟了中国经济应该进行的结构调整，留下了结构畸形加重、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价格暴涨、地方政府债务剧增、企业杠杆率升腾的历史遗产。

“强刺激”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中的“违禁药品”，我们一定要远离它。本来，我们就不应该热衷于所谓的“脱钩”的“中国模式”，如果那时开始经过三四年痛苦的调整期，现在应该与国际经济同步进入上扬期，而不是竭尽全力去担心达不到 7.5%！这就是我们过于在乎增长速度的代价！

三、需要高质量、低增长的发展模式

我们要“保增长”，还要“转方式”，要“调结构”，要“惠民生”，并要“抓生态”，我们总是按照“充分理性”来设计目标，希望每个目标都能圆满实现。可是，现实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们只具有“有限理性”而不具有“充分理性”，市场与政府都存在“失灵”的问题。在条件相对恶化的情况下，所有目标齐头并进，其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延续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格局。中国眼下最需要的是真正的改革！但是，不要理想地认为改革不仅不会影响增长，反而会促进增长，从长期看是这样的；但在短期里，改革一定需要相当的腾挪空间！这个空间需要以适度降低增长速度来换取。对产能过剩众多行业压缩投资，将影响增速；为防止房地产泡沫迸裂而实行一些限制，将影响增速；为治理生态环境而淘汰一些落后企业，也将影响增速；从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型，将影响增速……这是再浅显明了不过的道理啦。

是谁最在乎 GDP 的增速？一是各级政府。本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告别了两倍甚至三倍于 GDP 增速的时代，使得一些“运筹帷幄”之举常常捉襟见肘；经济增速如果再下滑，收不上那么多的银子，一些体现政绩的“大手笔”就只好泡汤了。这也是一些城市政府开始时是小心试探、进而半遮半掩、



最后是义无反顾地为房地产“松绑”的原因；二是那些“大而不强”、甚至是“僵尸”型的企业。退潮才知道谁是裸泳者。高速增长时所掩盖的矛盾、弊端、甚至是死穴，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分析近年上市公司的年报可见，一些迅速做大的“成长型企业”如果不是靠变卖资产，早就该退市了；一些“经营有道”的“世界 500 强”，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巨额补贴，早就显现出亏损的原形了。

现在，人们受困于增长动力的缺失。的确，靠消费拉动，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而且，在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显著减低之前，指望消费加速是不现实的。出口情况近两个月恢复势头不错，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偶尔实现 10% 以上的增速也许是可能的，但像加入世贸组织后那种排浪式的强有力拉动，是不可能再现了。剩下的只有投资了。GDP 增长靠投资拉动的比例始终占 50% 上下，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持续在 20% 左右，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2014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增速降至 17% 左右，就使得一些人不知所措，这说明我们经济结构是多么地脆弱，说明我们投资回报率是多么的低下，说明我们有多少无效投资，有多少“僵尸”投资！我们已经基本告别了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时代，就连一些新兴行业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没有个三五年时间恐怕难以消化。第二季度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实际上是消化产能过剩的好兆头。

笔者一定程度赞同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目前增长仍需靠投资拉动的主张。但是，在制造业几乎所有领域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加大投资力度，可是往哪里投呢？当然，应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但服务业对解决就业将会居功至伟，对拉动增长速度却不如制造业那般强劲。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但其回报期是漫长的，地方政府可能为此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继续大量投资房地产？房地产的泡沫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因为房地产早已绑架了中国经济。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进行实打实的改革！通过降低增速以换取调整的空间，打造出良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近 5 年来全国的投资率一直在 70% 上下，但北京市没有超过 40% 的年份，照样保持了 7.7% 以上的增长速度，尽管每年有五六十万外地人涌入，但城镇失业登记率一直低于 1.5%。因为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始终在 75% 以上。上海市 5 年来的投资率一直不到 30%，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2010 年为 0.8%、2011 年为 0.3%，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因为世博会使投资提前透支，但 2012 年为

3.7%、2013 年为 7.5%，上海不也保持 7%~8% 的增长速度吗？尽管“很丢人”地排在全国最后。但这是什么样的增长质量！什么样的投资回报！再说深圳，深圳市近年投资率没有超过 20% 的年份，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没有超过 15% 的年份，但每平方公里产出的 GDP 超过 1 亿美元，相当于以高产出而著称的上海的两倍左右。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突破 4%，接近韩国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 1 万件，占全国的近一半，涌现出中兴、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深圳创造”产业群。深圳的万元 GDP 能耗、水耗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frac{3}{5}$ 和 $\frac{1}{8}$ ，是全国最低水平。

如果全国都能达到北京、上海、深圳的水平，都能实现如此水平的低投入高产出，我们还需要那么多的钢铁、水泥、石油、煤炭吗？还会创造出那么多的 M2 吗？还会形成那么高的债务吗？还会有那么大的泡沫吗？要形成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样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必须改革，必须“退一步，进两步”。因为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增速在全国都是持续“垫底”的，但这却是实实在在地“转变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它不是匀速跑，而是变速跑。运动员中间需要调节节奏，需要补充水分，而不能靠打激素来维持。天上不会掉馅饼，“又好又快”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过于在乎增长速度，势必延误结构调整的时机。在市场经济中，增长有起伏是常态，对于增长速度的波动，我们实在应该淡定一些，从容一些，自信一些。历史经验证明：用两三年的时间降速调整，去杠杆，去产能，去泡沫，中国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原载《中国经济观察 2014 年第 3 册》）

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速效解药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一揽子列出了336项改革内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催生了亿万人民超越梦想的激情。人们热切期待停滞已久的改革能迅速又全面而重大突破，就像当年农村大包干、加入世贸组织后那样，推动全社会爆发式地发展，早日冲出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增长困境，进而顺利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啊，35年年均增长近10%，在短短10年时间里使国民生产总值从世界第七上升到第二，近日又成为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大国……“中国奇迹”“跨越发展”“大干快上”等，从来都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时代最强音。

然而，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发展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空间，不论是制度安排还是社会结构，中国经济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不要期冀什么“爆发式增长”，不要幻想什么“弯道超车”。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前期激进政策的消化期，三重叠加，对中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速效解药。

一、简政放权不等于制度完善

必须深化改革！就这一点全社会已经取得了共识。然而，改革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环节而大刀阔斧？人们还在苦苦寻求“最大公约数”。

简政放权，似乎成为了眼下的“牛鼻子”。而新一届政府一年多来以最大的努力去取消、减少、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似乎就是在诠释着“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道理。

的确，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断地放权分权。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城市企业松绑及双轨制、财政大包干与分税制等，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国家向社会分权，使得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非公经济占半壁江山；行政管理部门向企业分权，使得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营主体；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使得各地成为充满活力的竞争单元。尽管如此，由于各级政府众多部门仍手握大权而形成的“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中国式办证”等事实都充分表明，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时常使经济运行堵塞、使社会生产力窒息；取消、减少、下放大部门行政审批权，的确确是中央政府向市场献上的“大礼包”。

不过，依笔者之所见，简政放权是十分必要的，也应该是雷厉风行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未必是化解困境的灵丹妙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情景恐怕难以再现了。当固定资产投资日趋饱和、众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债务急速膨胀的时候，一些大型项目审批快慢、小微企业创业多少，已经不是迫在眉睫的关键了！而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恰恰是，遏制不住GDP冲动的地方政府裹挟着大企业，利用中央政府审批权下放之际，或化整为零或瞒天过海或未批先上，形成了“绝对性的产能过剩”。现在，全国制造业有19个行业的设备利用率低于国际标准，可却仍在疯狂扩张。如产能利用率不足70%的钢铁业，近期还将形成5000万吨的新产能；电解铝在建1000万吨项目都形成产能，行业设备利用率将降至50%；而光伏、风能发电、LED等新兴产业也走着传统产业的老路，由于急剧扩张而造成严重过剩。GDP至上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是靠下放审批权所能解决的。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似乎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放水”与“集权”的反复，条条与块块的冲突，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的纠缠，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不断尝试放权，如果出现问题，就收回一些；当发现激励作用不够时，再放一些。如此反反复复，寻找着中央与地方的动态均衡点。

以这种放收来寻求均衡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收放循环也是一个试错与纠错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在这放收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多，

市场也发挥着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调控思路与方式也由以前的放收“一刀切”转为“微调”与“点刹”。

有专家分析到，从放到收或是从收到死，大约为两三年的时间段。比如企业投资风电站的项目核准，“5万千瓦以下风电项目”的审批权以前归属地方政府，由于盲目无序扩张的结果，国家能源局在2011年8月收回了该项目的审批权；但是在2013年5月，这项审批权又下放了。不少人发出质疑，现在大规模下放行政审批权，两三年后会不会出现“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经济乱象？尽管一些部委首长和经济学家信誓旦旦地保证此次不会再出现“放乱收死”的怪圈了，但这话在10年前处理“铁本事件”时、20年前治理两位数通货膨胀时都听说过；至于“淡化GDP考核”“各部门尽职尽责协调监管”“地方政府要有大局意识”等，并不是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不过是道义道德的号召，在巨大的利益博弈面前显得是那么地苍白无力。

笔者认为，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消、减少、下放行政审批权固然重要，但本质的问题在于，要尽可能靠制度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尽可能缩小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如一味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如强力左右企业投资方向与规模等。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伴随增长的环境污染等，无时不在昭示着市场经济可能出现失灵的外部性效果，这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中国历史上就是体量很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需要一定的集权来整合各种力量，以维护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以防止地方利益的“尾大不掉”。当然，这种作用更多的应是以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来发挥的，而不应是主观性随意性很强的行政手段。这样，才能摆脱放乱收死的怪圈制约。

其实，可能出乎很多人“刻板成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比较充分的国度里，政府审批与管制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日本政府在2008年时行政审批达13869项，相当于目前我们国务院60个部门的1235项的10倍以上，不过其中9808项是法律规定的审批，体现了以法律为中心的特点。美国每年通过的管制条例高达4500多项，现在实行的管制条例多达几万项。美国政府2001年的管制成本为8000多亿美元，占GDP总值的8%左右，联邦政府雇用的管制人员达13万之多。

所以，一位美国学者惊讶于中国政府的管制作用太小、人员太少了，尤

其是环保方面。不过，这种“管制”不仅包括事前的审批，更多的是事中和事后的严格监管。我们的政府部门多年来始终把重心放在事前的严格审批上，无心也无力进行事中与事后全程监管。热衷于开会布置但往往是走了过场，突击性的各种“大检查”往往成了“雁过拔毛”；即使上面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常常有地方政府的庇护，即使遭到罚款等处理，违法违规成本往往很低。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了，放了审批不出现乱象才怪呢！

简政放权的确是一着好棋，减少管制也是世界潮流。不过，即使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都能达到美国与日本的管制水平，放乱收死的问题也未必会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中的一些人还可能“寻租”，所以，不能仅仅围绕政府在放权收权上转圈圈，而应增加新的改革因素，在制度上形成公众、媒体、社会组织等对政府的有效监督，目前特别应完善人大与政协等体制内已经存在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简政放权后经济秩序的有条不紊。

简政放权的确可以极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目前各地新办企业登记剧增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恐怕难以承担“全面引爆”之大任。

二、别指望什么“一股就灵”

2014年2月，几则来自国企巨头的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石化准备将估价超过3000亿元的销售端资产打包重组，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试验，出让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中石油提出将以上游6亿吨储量的区块来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勘探开发，最多可出让49%的股份；格力集团将以不超过49%的股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此前后，上海、广东、重庆等国资重镇都有所动作。各地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混合所有制。

眼下，“混合所有制”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话题。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使得一些人们对以混合所有制形式促进国企改革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有人认为这是继90年代关停并转与政企分开、世纪之交抓大放小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之后，将掀起第三波国企改革的大潮。有人马上著书立说，论证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

其实，这混合所有制并算不上“新生事物”。早在1946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就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不过他是从社会福利角度阐述的。1976年，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逊在其经典的《经济学》第十版中论述道，“现代经济日益成为混合经济，是政府与企业的混合。”再说，如果按字面的意思理解，我国已有不少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了。据统计，央企引入非公资本的已占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到2012年底，央企及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378家，非国有股权已占53%；地方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681家，其非国有股权已超过60%。这不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吗？当然，谁都明晰：混合了是不假，但这些上市公司基本都是“一股独大”，其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很难说是实现现代管理制度的企业。

可能正因为如此，有国资委领导告诫道，不要期待“一混就灵”，国企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

国企必须改革，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命题。那么，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就众说纷纭了。笔者认为，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纯而又纯的国企数量减到尽可能少的程度。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其实，35年改革历程已经客观上印证了这一点。笔者并不赞成全面私有化，中国存在一定数量的国企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国企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是公平！哪怕是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的公平！

如果以效率为标准，那国企就没有理由存在了。因为效率是国企的先天不足，尽管国资管理部门主张提速增效，提高国企利润上交比例以平息社会不满；但与非公企业相比，国企高效是特例，而国企低效则是通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铝业巨头中铝公司市场份额不断收缩、连年巨亏，可在相同的环境里，魏桥、信发等民营企业却红红火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信发铝电董事长曾对媒体透露，在某地我们企业的生产规模与中铝分公司差不多，我们员工有1100人，可他们的管理人员就超过1100人！这样的企业会有效率吗？中石化的巨额利润一再引发关于垄断的种种议论；其实，中石化的经营效率实在太低了。2009年世界500强中，埃克森美孚以4428.51亿美元的销售额居次席，取得利润452.2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10%上下；中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销售额名列第9位，但其利润只有19.61亿美元，销售利润率仅为0.94%！埃克森美孚员工人数为8万人，中石化拥有66万员工，那年的总用工为106万人！有人测算过，非金融类国企的总资产回报率从2007年